

第二十一章

历史

香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蜕变，
与时俱进，民生逐步改善，社会日益进步。
时至今日，香港已成为其中一个领先国际的金融贸易中心。

考古发现

香港考古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沿海多处地点出土的古代人类活动遗迹，证明本港历史可远溯至六千多年前。从考古学角度来说，香港或许只是华南文化领域的一小部分，而学者对这个广阔领域所知仍属有限。

有人认为，本地史前文化是受到华北或东南亚地区文化入侵演变而成的。不过，愈来愈多学者相信，华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在本土逐渐形成，并没有受到外来文化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研究公元前四千年开始出现的最早期文化，无疑要顾及环境转变的因素。其间海平面由低于目前水平100米之处不断上升，淹没沿岸的广阔平原，形成今天的海岸线和环境生态。在该地区生活的人必须适应环境，否则便遭湮没。

考古发掘主要发现两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青铜器约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出现，这是香港史前最后一个阶段。虽然当时没有广泛使用青铜器，但香港考古遗址曾有矛头、箭镞和戈等精巧青铜兵器出土，也发掘到刀、鱼钩和斧等青铜工具。在赤蠟角过路湾、大屿山东湾和沙螺湾、屯门扫管笏，以及南丫岛大湾和沙埔村出土铸造青铜器的石范，足可证明本港有铸造青铜器。

青铜时代陶器的印纹，大都与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的几何图案一脉相承，但其中的“夔龙”、“夔纹”则是该段时期区内特有的纹饰。

早期中国文献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为“越人”。因此，很可能至少有部分本港史前先民是“百越人”。

此外，在大屿山石壁、濠西洲、蒲台岛、长洲、东龙洲、港岛大浪湾和黄竹坑等地区，也发现了几何图案和状似动物图案的石刻，很可能是本地先民所造。

秦(公元前二二一至二零六年)汉(公元前二零六年至公元二二零年)时期，朝廷挥军南征，平定岭南。南迁的汉人不断增加，对原居民产生种种影响。这段动荡的历史可从本港出土的汉代钱币得到证明。不过，最重要的遗迹，当然是一九五五年在深水埗李屋村和郑屋村附近发现的完整砖室墓。这座古墓随葬典型的汉代明器，可推定为东汉初期至中期的古迹。在大屿山白芒、濠西洲、马湾东湾仔及屯门扫管笏进行的发掘工作，都在文化层出土各类汉代陶制器皿、铁器和大量铜钱。此外，在旺角渠务工程地盘也发现四个陶罐。

汉代以后的考古遗迹至今所知甚少，关于本港各海滩常见的圆拱型灰窑的发掘和研究结果，正好帮助了解唐代(公元六一八至九零七年)本港居民生活的一面——石灰的使用。石灰是当时很有价值的商品，并且用途广泛，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

公元十三世纪，元兵南下，结束宋室统治。香港与这段历史渊源深厚。九龙城的宋王台石刻，大庙湾天后庙附近的宋代石刻，石壁、米埔和奇力岛出土的宋代窖藏钱币，启德机场旧址出土的建筑遗迹以及在启德旧址、九龙大磡村、大屿山稔树湾、石壁和元朗鳌磡石等多处发掘到的宋代青瓷，都是这个时期的文物。

近年的考古研究提供了一些新资料，有助进一步探索明代(公元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和清代(公元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期间的本港历史。研究工作包括分析近年在大屿山竹篙湾出土的大量明代青花瓷器。研究结果显示，这类瓷器制作非常精巧，是输往东南亚和西方国家的外销瓷器，在公元十六世纪初制成。二零零一年竹篙湾出土了更多明代的文物，其中包括具特色的明代建筑和居住遗迹。大埔碗窑遗址的考古调查发现，本地窑工可能早在明代已开始制造青花瓷器。香港的瓷器工业一直维持至二十世纪初，历时三百多年。二零零零年及二零零八年在扫管笏遗址进行的发掘，发现合共九十多座明代墓葬，陪葬品包括瓷器、铜钱和铁器，为研究明代本地居民的生活提供了新资料。

东龙洲清代炮台的发掘，使市民可以了解炮台的内部结构，以及清末屯驻香港的官兵所使用的日常物品。九龙寨城的考古勘查，发现了寨城的城门遗迹和南门上两块分别刻有“南门”、“九龙寨城”字样的石碑。启德发展计划的环境影响评估工作，也发现了龙津石桥遗迹。石桥在一八七五年建成，连接九龙寨城与海岸，用作登岸码头。

通商港口

开埠初期，人们见香港地瘠山多，水源缺乏，认为并非安居乐业的好地方。当时香港只有村民约3 650人，散居逾20条村落；另有渔民2 000人，栖宿于港口的渔船上。港口是

香港唯一的天然资产，位置优越，处于通往远东的贸易通道，不久还成为与中国进行转口贸易的枢纽。

自一八四一年英国人前来定居之后，香港逐渐发展为商业中心。十八世纪末，英国人操纵了广州的对外贸易，但由于中英文化不同、观点迥异，他们对当时的情况未感满意。当时中国自视为独一无二的文明大国，在广州经商的外国人，居住和其他方面都受到诸般限制。外商只准在商馆区范围内活动，而且只可在贸易季节逗留，其间家眷只得留在澳门居住。此外，外商也不得入城，又不许学习中文。中国在徵收船税方面并无划一标准，时常引起争端。虽然如此，中英商人仍能互相信任，无论交易额如何巨大，都口头成交，一诺千金。

初时，中国在贸易得利，银元大量流入。不过，自一八零零年开始，鸦片贸易蓬勃，形势即告逆转。清廷早在一七九九年已明令禁止输入鸦片，但自一八三四年东印度公司丧失对华贸易的特权后，外商为图暴利，纷纷加入鸦片商贩行列，中国银元外流的情况更趋严重。有见及此，清廷在一八三九年三月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赴粤，厉行禁烟。林则徐抵粤一周，立即派兵封锁商馆，不准任何人离开，又断绝粮食供应，直至外商交出全部鸦片为止。他着令外商和船长具结，以后不得再输入鸦片，违者正法。英国商务监督义律和其他英商被围困六星期后，迫得下令缴出鸦片共20 283箱。

义律随后向英廷详细报告，并决定在接获指示前暂停通商。英侨于是撤离广州，往澳门暂居，但因澳葡总督声言难以保障他们的安全，英侨在一八三九年夏季全部退居香港港内的船舶上。

事已至此，英国外务大臣彭玛斯顿勋爵认为必须解决中英贸易关系问题。他认为英侨缴出鸦片，无异被迫缴纳赎命金(英侨其实没有生命危险)，因此要求中国与英国订立贸易条约，以平等地位通商，或割让一个小岛，使英侨能在国家荫庇下生活。

为使中国就范，英国显示实力，远征军在一八四零年六月开抵中国，于是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一八四零至一八四二年)。双方且谈且战。林则徐在初步谈判失败后遭撤职，由琦善接任钦差大臣。其后，琦善与义律达成协议，战事才告一段落。

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双方签订《穿鼻草约》，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英国海军于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在水坑口(即今日上环荷李活道公园一带)登陆升旗，香港正式成为英国属土。同年六月，义律把土地分段出售，香港开始有移民居留。两国政府都不承认《穿鼻草约》。中国视割地为奇耻大辱，举国震怒，清廷于是把琦善撤职，解京查办。英国方面，彭玛斯顿勋爵也大表不满，认为香港是“一个杳无人烟的荒芜小岛”，不足以代替通商条约。

彭玛斯顿勋爵严厉谴责义律漠视训令，召回义律，另派砵甸乍爵士接任。一八四一年八月，砵甸乍爵士抵达香港，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一年后，砵甸乍爵士挥军溯长江而上，直迫南京，中英双方终于在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订立《南京条约》，战事才告平息。

当时，英国维新党政府下台，新上任的保守党外务大臣阿巴甸勋爵在一八四一年向砵甸乍爵士发出新训令，撤回割地的要求。砵甸乍爵士在冬天停战时返抵香港，对香港的发展甚为满意，故此在订立《南京条约》时违背英廷的训令，不仅订立通商条约，而且要求中方割让香港。

清政府还须开放广州等五个地点作为通商口岸。该通商条约其后并入一八四三年十月缔订的《虎门善后条约》。根据条约，华人获准自由到香港经商。

租借新界

中英两国对前订条约的诠释各执一词，最后引发第二次中英战争（一八五六一至一八五八年）。战争的导火线为中国水师登上英艇“亚罗号”（船身为西式设计，配备中式索具）搜捕海盗，因而发生冲突。结果两国在一八五八年签订《天津条约》，英国可派遣外交代表到中国，战事暂时结束。第一任使节是香港首任布政司布鲁司爵士，他奉命前往北京呈递国书，但途经大沽突遭炮轰，战火于是在一八五九年再起，到一八六零年才平息。

从本港早期照片所见，参与第二次远征的英军曾在九龙结营。英军发现当地环境适宜，拟保留九龙半岛驻防，经英国驻广州领事白加士爵士与两广总督交涉后，获得九龙半岛南端（北至界限街）连同昂船洲的租借权。一八六零年，战争结束，订立《北京条约》，九龙半岛正式割让予英国。

及后，欧洲各国和日本也相继向中国要求租借土地。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结束，德、法、俄三国曾为中国说项，自此需索更多。局势趋于紧张，英国认为要防卫香港，必须取得邻近土地的控制权。

根据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在北京签订的条约，中国同意把九龙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地域，以及235个岛屿，租借给英国，为期99年。英国此举仅在针对法俄两国，而非对付中国。中国军舰仍有权使用九龙城的码头，中国仍然保留该处的行政权，“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英女皇会同枢密院议决撤销这项条款，由英国单方面接管九龙城。在此之前，英国人已在一八九九年四月接管新界。接管初期，仍有零星反抗，但后来终告停止。新界遂成为香港的一部分，但与市区分开管理。

初期发展

香港开埠初期发展并不顺利，不良分子麇集，罪行猖獗，热病和台风威胁居民的生命财产，不过，仍然有很多华人移居这个由外人统治的小岛。一八五一年，香港有人口32 983人(华人有31 463人，占总人口的95%)；一九三一年，人口增至878 947人(华人有859 425人，占总人口的97.8%)。

香港的华人只求不受干扰，故在港英政府的开明统治下，都能安居乐业。香港渐渐成为中国移民的聚居地，以及与海外华侨通商的中心。使用本港港口的远洋船，在一八六零年有2 889艘，一九三九年增至23 881艘。香港主要与中国通商，因此不得不顺应中国习惯，在一八六二年采用银元制。中国在一九三五年放弃银元本位，香港也随之改变币制。

香港政制采取英国海外属土常用的模式，总督由英廷任命，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由政府委任，大多数为官守议员。立法局第一批非官守议员在一八五零年委出，至一八八零年才有华人议员(新加坡出生的律师伍才(又名伍廷芳))。一八九六年行政局开始有非官守议员，而首位华人议员(周寿臣爵士)则在一九二六年委出。长期以来，香港总商会和非官守太平绅士这两个选举团体，都有权各自提名一人为立法局议员，但这项安排已在一九七二年终止。

在港居留的英国人数次力促成立自治政府，但英廷一直不予首肯，称香港华人占多数，难以由少数欧籍人士统治。一八八三年政府成立卫生局，并由一八八七年开始以选举方式选出部分成员。卫生局其后在一九三六年改组为市政局。

最初香港政府有意从内地借调官员管理华人，但这种并行的政制从未认真施行。由于罪案日多，这个制度终于在一八六五年废除，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取代。同年英廷大幅修订香港总督的训令，规定“如任何法例对亚非裔人士有所禁制，而欧籍人士则不受其限者”，总督不得批准施行。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把香港发展为开放营商贸易之地，一切秉公办理。

香港开埠以后，公用事业相继开办，计有一八六一年成立的香港中华煤气公司、一八八五年的山顶缆车公司、一八八九年的香港电灯公司、一九零三年的中华电力公司、一九零四年的电车公司等。至于九广铁路，则在一九一零年建成。自一八五一年起，香港陆续进行填海工程，较重要的是一九零四年完成的中环填海工程，以及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九年间进行的湾仔填海工程。现在的遮打道、干诺道和德辅道，都是在中环填海之后辟建出来的。

一八四七年，香港政府推行公立学校教育制度，补助中文学校的经费。一八七三年，主要由教会营办的义学也纳入政府补助计划内。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在一八八七年成立，当

时有两名学生，其中一人是孙中山先生。书院在一九一一年扩展成为香港大学，开设文学院、工学院和医学院。

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后，中国长期动荡不安，很多华人来港避乱。中国虽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未能藉《凡尔赛和平条约》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加上战后国民党推行急进政策，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高涨，动荡局面一直持续。

中国当局力争废除外国凭藉条约取得的一切特权，并因此而抵制外国货。不安的局势延及香港，一九二二年发生海员罢工事件，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间在广州发生的事件还演变为省港大罢工。风潮虽然逐渐平息，但香港居民的生活已大受打击。当时，英国在中国境内拥有的外资利益最多，因而成为排外运动的主要目标，但反日情绪不久便取而代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条款。一九三一年，日军占领东三省，并企图吞并华北省份，终于导致一九三七年爆发中日战争。一九三八年，广州沦陷，大批难民涌入香港。估计在一九三七年抵港的难民约有十万人，一九三八年有50万人，一九三九年则有15万人，使香港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增至160万。难民抵港的高峯期，估计约有50万人流离失所，露宿街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空袭珍珠港，轰炸美国军舰，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差不多同一时间(香港时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进攻香港。日军取道中国大陆出师，英军被迫撤离新界和九龙，退守港岛。当时守军包括香港义勇军，苦战一星期后，因众寡悬殊，难扭劣势，终在圣诞节投降。

日本占领香港三年八个月。沦陷时期，贸易停顿，货币贬值，粮运不继，政府服务和公用事业大受影响。不少港人避居中立的葡属澳门，澳门政府也尽量收容。日治末期，为解决粮荒，日本人驱逐大批居民离境。

本港居民虽然备受压迫，但大部分仍拥护同盟国阵线。中国游击队在新界四出活动，逃匿的盟军人员也得到村民掩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传来，沦陷期间被囚赤柱监狱的布政司詹森(后获封爵士)随即组织临时政府。八月三十日，海军少将夏 爵士率领英国太平洋舰队抵港，成立临时军政府。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总督杨慕琦爵士回任，香港正式恢复民政统治。

战后发展

战时，不少华籍居民返回内地。日本投降后，他们纷纷回港，每月几达十万人之多。香港人口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原已减至约60万，但到一九四七年年底却激增至180万左右。

一九四八至四九年间，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与共产党交锋，败象初呈。很多人从内地涌入香港，人数之多，破了历来的纪录。一九四九至五零年春，有数十万人移居香港，他们主要来自广东省、上海和其他商业重镇。至一九五零年年中，估计全港人口已增至220万。此后，香港人口不断增加，一九七一年达400万，一九八零年达500万，一九九四年达600万，目前已超逾700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大量移民涌入，寮屋数目因而激增。一九五三年圣诞节，一场木屋区大火令53 000名居民无家可归。政府须急切安置灾民，香港的公营房屋计划亦由此展开。时至今日，本港已有周全的公营房屋计划，提供各类设备完善的租住公屋和自置居所单位。二零一五年第一季，约有210万人(约占人口的30%)居于租住公屋单位。

韩战爆发，联合国于一九五一年对中国实施禁运，本港经济一度停滞不前。此外，香港人口激增，不能单靠港口来维持繁荣，于是开始发展工业。随着纺织厂相继设立，香港的制造业开始兴起。纺织厂逐渐增加产品种类，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扩展至生产人造纤维和成衣，所输出的纺织品和成衣占本地产品出口总值约一半。

一九六六年，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香港局势日趋紧张。一九六七年，本港发生连串社会骚乱，市民生活大受影响，经济陷于瘫痪。幸而情况在年底受到控制，本港得以继续平稳发展。

香港的转口港业务不断发展，与内地的贸易增长尤为迅速。此外，香港的旅游业日益蓬勃，交通也大为改善。在地理环境上，香港是内地的天然门户，每年从香港启程或过境进入内地的旅客愈来愈多。

政府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推行两项高瞻远瞩的计划，影响深远，逐步打造出香港的现今面貌。首先，为配合十年建屋计划，政府在一九七二年决定在新界发展多个新市镇。在随后的20年间，香港共发展了九个新市镇。目前，香港大约有47%人口住在这些新市镇，纾缓了市区的发展压力。同时，政府在一九七六年制定《郊野公园条例》，为设立郊野公园及特别地区提供了法律依据。现时，香港有24个郊野公园和22个特别地区，约占香港土地面积40%，保育不同的自然生境。

一九七五年，越战结束，大量越南难民涌入香港。由那时开始，直至二零零零年最后一个难民营关闭，共有超过20万名越南难民来港。在这些难民当中，超过143 000人获安排移居海外，约72 000人被遣返越南。

迈向新世纪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新界租借期限将于一九九七年届满，香港开始面对不明朗的前景。一九八二年，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商讨香港前途问题，揭开了中英政府持续两年谈判的序幕。双方随后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就香港问题签署《中英联合声明》。《联合声明》阐述了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

香港特区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于同日生效。《基本法》是香港特区的宪制文件，规定香港须施行的制度，并以法律的形式，订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等重要方针。为落实这些方针，《基本法》订明，香港特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

香港经历的转变不限于政治方面。多年来，制造业的生产重点逐渐由当年简单而劳工密集的产品，转移至今天精密先进的高增值产品。工业家看准珠江三角洲丰富的土地和人力资源，把生产基地跨越边界向北扩展，营运总部则仍然留在香港。这种经营模式有助推动区内经济发展，促进香港逐渐蜕变成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二零一二年，产品出口占本港出口总额不足2%。

为配合各项发展，政府致力改善和增建基础设施。四通八达的道路和铁路，以及一流的港口和机场设施，使香港成为现代化都会。新建的公路，令往来偏远地区的交通大为改善，铁路网络也陆续伸展。位于赤蠟角的香港国际机场，在一九九八年落成启用。

香港经济基础日趋稳健，政府得以逐渐增加教育、社会福利、卫生和其他民生方面的开支，开支总额由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的2,331亿元增至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预算的4,408亿元。

由一九七八年开始，政府为入读公营学校的所有学童，提供免费的小学 and 初中教育；自二零零八年九月起，高中学额和职业训练局为中三离校生而设的全日制课程，也免费提供。此外，专上教育继续获政府大幅资助。政府的政策是要确保学生不会因经济状况欠佳而失学。

多年来，本港社会福利服务的范围和模式不断演变，日益全面、完备和普及。过去十年，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由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的333亿元增至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预算的677亿元，增幅超过一倍。

香港的医疗体系原是因应战后初期香港人口激增的情况而发展。其后，为配合政府在保障公众健康以及为全港市民提供医疗护理和设施方面所作承诺，政府大力扩展香港的医

疗体系。一九九零年，政府成立独立运作的医院管理局，由该局负责管理所有公立医院，并基于不应有人因经济困难而得不到医疗服务的原则，提供多项由政府大幅资助的公营医疗服务。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医管局辖下有42家公立医院和机构、47家专科门诊诊所及73家普通科门诊诊所。

香港有完备的劳工法例(包括最低工资法例)，以保障雇员的福利和权益，并照顾他们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此外，政府又提供免费就业和招聘服务，协助求职者和雇主。雇员再培训局为失业者和受经济转型影响的人士提供培训及再培训课程和服务，协助他们提升技能，配合不断转变的劳工市场需要。